邓初民

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

任何民族，任何人类，到了它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划开了群体的一致性，而有了各种社会层对立时，某一群人（或某一社会层）借着一种强制权力（后来便演进为公权力或政权）来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有了必要。这种一群人统治另一群人的行为，就是政治行为。这种政治行为，不是徒然的，主要（或唯一）是要达到一种经济目的，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或者是经济上的优势者占有者，为要永久保持其优势和占有，需要政权的行使来统治、支配经济上之劣势者或不占有者，例如奴隶社会主人之对于奴隶，封建领主之对于农奴，资本社会之资本主之对于雇工。或者是经济上的劣势者或不占有者，为要消极的解脱其经济劣势和不占有地位；积极的创建一种经济平等，政治平等，文化平等的社会，需要政权的行使来制服、平抑、甚至取消经济上的劣势者或占有者，如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苏维埃政权之对旧俄的资本家、地主、僧侣、贵族、王室等等。这次全世界范围内的民主主义反法西斯战争，其政治意义为“尊重各民族有权自由决定其所赖以生存之政府形式”，其经济目的，则在“促进世界各国经济上之全面合作，以谋各国人民劳动标准之提高，经济之进步及社会之安全”，“使各国俱能在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以上所引俱见《大西洋宪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了不平衡状态，经济上的优势者和劣势者，占有者和不占有者，都需要政权的行使来完成各自的经济任务，达到各自的经济目的，政治便成为经济之集中表现，成为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之一手段，政治是服从于经济的。但这一完成经济任务，达到经济目的政治手段，其本身亦有其任务与目的，即完成经济任务的政治任务，达到经济目的之政治目的。自从政治本身其任务需要完成，其目的需要达到以后，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东西，只成为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之一手段，例如宗教、学术、思想等等之政治作用就是这样的。较具体而又强有力的一种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手段，莫如教育。试看由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古代的、中世纪的奴隶政治、专制政治，便有古代的中世纪的奴隶教育、专制教育。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近代的民主政治（虽然是形式的，虚伪的，但有旧型的新型的不同），便有近代的民主教育。由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要求，产生了苏联的民主政治，便有苏联的最新型的民主教育。

因此我们可以结论为：自从政治本身成为一种目的后，有了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种手段，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

这里，我们主要的论点，是“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如前所附注，民主有旧型的，新型的，而苏联的民主政治还是最新型的民主政治，然则这里我们所论述的民主政治，是那一种型的民主政治呢？是否需要申论？由于民主政治之有旧型新型最新型的区别，民主教育当然也有这几种区别，然则我们在这里所论述的民主教育，又是那一种型的民主教育呢？是否需要申论？这可以说都有必要，我们可以大概的说：在今天旧型的

民主（亦即资产所有者一阶级专政的民主）是过去了，而最新型的民主（亦即苏联工人大众的民主）还一时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今天民主的主潮是新型的民主（亦即各阶层各党派联合的民主），因此，我们这里所论述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也就是新型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

然则什么是新型的民主政治与民主教育？这仍是一个复杂而又庞大的题目，没有篇幅让我们细加申论。根据我们前面提出的论纲：“有什么政治就有什么教育”，这里重要的不是什么是民主教育的问题，而是什么是民主政治的问题。

什么是民主政治呢？顾名思义的从其抽象概念来定义，可以说民主政治就是由人民作主的政治，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人民是主人，政府是公仆，一切公务员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但民主政治又是一种制度，由这种制度所表现的形式来说，凡是民主制的国家，必然要有人民选举的国会及各级议会，必然要有由国会及各级议会所制定颁布的法律，而这种法律必然要为举国上下所共同遵守，所谓法律之前，万人平等，尤其是人民的权利义务，必然要明确规定于各种法律之中，尤其是宪法之中，如人民有选举权被选举权，乃至创制，复决，罢免诸权，人民有言论，思想、出版、集会、结社、迁徙、营业、信教、通信秘密之各种自由，乃至罢工，罢市、游行、示威之各种自由，这些都是民主政治之最低限度的自由，也就是民主政治之最明显的标帜。但是在旧型的民主政治中，这些在法律条文上虽有规定，而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人民未必都能享有，如在法律上规定出版的自由，而在实际上不给以出版的纸张及印刷等都是明显的例证，而在法西斯国家，则干脆剥夺人民一切自由与权利。所以民主政治有形式与实质之别，这次世界大战，是民主反法西斯的战争，因而所争取的是实质的民

主——新型的民主，虽然民主的进路也不会就停止在一步上，也就是说历史的车轮，必然要由新型的民主，走向最新型的民主，但这是后话。

实际的民主与新型的民主，或者说新型的民主与旧型的民主，已经是在许多年月中，常常扰乱人们的脑筋，使它模糊、混乱。目前到了民主反法西斯战争决定胜利的时候，许多原来的法西斯份子，准法西斯份子，半法西斯份子，也想拿民主的外衣来包裹法西斯残骸，因而法西斯也喊出民主的口号来，也就是说：“强盗也喊捉强盗”，这样，挠乱人们脑筋的，就不仅是形式的民主与实际民主的问题，还有一个民主与法西斯的问题。民主说得太多了，法西斯也听得太熟了，真诚拥护民主的人们，口里说“民主”“民主”，骨子里是法西斯的人们，口头上也在喊“民主”“民主”，一不当心，就“鱼目混珠”了，所以在说明什么是民主政治的时候，固然要把形式的民主与实质的民主，旧型的民主与新型的民主区别开来，尤其要把新型的民主，实质的民主，与法西斯的民主（法西斯假扮的民主，实质上是法西斯）区别开来。

民主与法西斯这两个概念，由于习焉不察，由于鱼目混珠，正在这个当儿扰乱了人们的脑筋，模糊了人们对于民主与法西斯之正确认识，在这里使得我们必需把民主小姐（借用陶行知先生的名词）与法西斯魔鬼（我自创的）的画像具象化，我以为凡是在实际上（不是在形式上，不是在法律条文上），人民享有上述各种权利（选举、创制、复决、罢免诸权利）与上述各种自由（言论、出版、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的地方，亦即没有新闻检查制度的地方，没有镇压人民的各种法令的地方，没有秘密警察的地方，没有集中营等等的地方，没有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的地方，没有人身之不能获得确切保障的

地方，才是民主小姐管领的地方，否则就是法西斯魔鬼统治的地方。民主小姐的可爱、可恋、可敬的美丽，与法西斯魔鬼的可恨、可恶、可杀的丑恶凶狠，是亮晶晶的纹理明晰的两座大理石塑像，决不是可以任意颠倒的抽象的概念，在这里是行动决定一切，是事实决定一切的问题，不是有否法西斯思想的问题。

什么是民主政治呢？请把民主小姐那座美丽的大理石塑像看看，这是实质的民主，不是形式的民主，这是新型的民主，不是旧型的民主，有了这种民主政治的地方，才有这种民主政治的教育。你感觉到今天的教育不民主，甚至愤慨今天的教育不民主吗？这是应该的，但这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这不能单从教育本身求得解决，这是由于政治不民主，教育是服从于政治的，教育是完成政治任务达到政治目的的一手段，你必需把整个政治生活改变，必需使整个生活民主化了，教育才能民主化。教育界的讲学自由，读书自由，阅报自由，选课自由，转学自由，推而及于言论、思想、集会、结社等等自由，都发源于整个政治生活的民主自由。

热心，努力，拚死要求民主教育的人们，首先需热心努力，拚死要求民主政治！

原载重庆《民主教育》创刊号(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一日)。又见《文萃》第一年第十一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八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袁月楼

唯生进化论与各派学说之比较

进化论是探究社会进化的原因，从而求出其历史进展的一般普遍法则。这个问题的答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观点与结论，各异其趣。择其历来哲学上主要者言之，约有四派：一是唯心史观，二是唯物史观，三是心物二元史观，四是唯生史观（或称民生史观，唯生与民生，实同一意之两个名辞，譬如唯心史观之可称为精神史观，唯物史观之可称为经济史观一样）。

唯心史观者以心理条件为中心，亦即谓精神支配一切，对历史的进化，多以政治、宗教、伟人、天才等唯心的观点去解释；认为各种各类的社会现象，都是人类思想意识的表现；宇宙万物无不是从人类精神中创造出来的。并以人类的思想意识，为社会进化的动力。如柏拉图在其认识论中，谓“观念”乃生命之主宰力，因此，更视观念为构成世界的工具和历史的支配者。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陆象山所谓：“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更进而认为“大地山田，皆由心造”。这就是说人可随心所欲，意志，可以自由，观念作用大于一切。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理性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支配者，理性是一种纯粹先验先在的东西，超然于宇宙万物之外。他的历史哲学，就是以理性为史观的本体，认为历史现象不过是理性依辩证法之正反合的发展过程，换言之，理性是历史的创造主，历史不过理性之外部现象。又如欧洲人之信仰上帝，以为

自然界及人类社会，都是由上帝创造;人类社会中一切幸灾祸福，也都由上帝安排。因此，上帝便成为人类社会和历史的最高支配者。在中国方面，普通一般人把“天”看作一切人事现象的支配者，举凡朝代的兴亡，个人的生死，荣辱、富贵、贫贱、祸福等，一概都归因于天运气数，认为系由“天”来操纵。这种用观念，理性，或上帝与天去说明历史，虽在名称上稍有不同，然而所谓观念，理性，或上帝与天，都不外精神的别名，所以统称之为唯心史观。它们都用精神现象来决定物质现象，认定人类历史的重心，是精神而非物质。唯心史观之看重精神作用高调精神万能这一点，固然且有一面的真理。但它认为精神是超越宇宙万物而独立存在的，就是物质亦为精神所产生，精神可以不藉物质而表现其作用。故其说过于虚，不着实际，这样，历史发展之现象，更只是一个抽象的思维过程，因而常与客观事象相背驰。

唯物史观者则看重物质，认为人类思想是物质条件的产物。以物质为历史的中心来解释社会的进化。物质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物质，即天然存在的；一种是社会的物质，即人工制造的。因此，唯物史观亦可分自然的与社会的两种。自然唯物史观者，如天文家以星球现象解释人类历史，有人认为太阳中发现黑点，人类便要发生战争，即其一例。研究地理者以地理环境解释人类历史，譬如有人认为中国社会所以停滞在封建时期很久而未能如欧洲一样发展到资本主义者，即由于中国是大陆国不是海洋国的缘故，这便是用地理环境说明中国历史的例子。研究生物学的便以“社会集团性”解释人类历史，以为各国有各国的社会集团性，所以各国就有各国的思想，文物、制度、风习，这就是以社会集团性为历史进化的原动力说明历史的变迁。研究人种学的便以人种遗传性解释人类历史，认为

种族遗传是一成不变的,优秀种族天生优秀，劣等种族天生劣等，永久不变；因此，一切社会的发展与没落，政治经济的变动，道德品性的优劣，都是由于社会中某种优秀或低劣种族成分的增减关系，这就是以天生的种族性为历史重心和原动力来解释进化的。但无论是星球现象，地理因子，或社会集团性与种族性，都不外是自然的物质；所以用这些东西解释历史变迁和社会进化，都可统称之为自然唯物史观。这种自然唯物史观，认自然的物质对人类历史有很大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人类历史为自然之发展，无论是以星球现象，地理因子，与唯物集团性或种族性来说明历史进化，均有其相对的正确性。譬如地理环境实为人造历史的前提条件，人类不但不能离开地理环境而活动，反之，还必须依存它而始有所作为，故地理环境对历史的影响很大，寒带、热带、温带人的社会历史各不相同，大陆国与海洋国的社会历史也不相同，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不过自然唯物史观只看见自然环境影响人，改变人，而不知人亦影响自然环境，改变自然环境；要知人类历史虽为自然之发展，但自然只是历史中客观的被动的因子，而人类才是历史中主观的自动的因子。人类具有精神作用，意志作用，人在自然环境中，不只是消极的受自然的影响，且能积极的反作用于自然，改变自然而为自然的主人，所以历史是人创造的，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没有人则绝对不会有历史。譬如以地理因子来说，人固然不能离地理环境而活动，因而要受地理因子的影响，然人类如果完全受地理因子的决定，就要象动物一样，不能创造历史。所以自然唯物史观忽略了人力，有机械之失。

其次，说社会唯物史观。所谓社会的物质，即自然物质经人工改变而成的东西，通常都把它叫做经济，所以社会唯物史

观，又叫经济史观，马克思便是这派学说的创始者。他认为有什么生产工具就有什么生产关系，有什么生产关系，就有什么政治制度和观念形态，因而构成整个的社会和历史。适应于生产工具之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是社会的经济构造，即下层基础，政治制度和伦理，法律，学术等，乃是它的上层结构。由这种横的社会结构观演成纵的社会进化史，则以生产工具的变动为究极动因来说明历史进化；详言之，即开始生产工具发生变动，然后生产关系作适应的变化，于是社会的经济机构改变了，建筑于其上的政治制度和伦理、法律、学术等亦必随之而变动。换句话说，历史的活动，乃超离人类意识以外，而须依赖于一定的经济法则。这种学说，看重社会的经济力量，固不必否认，因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所谓生活，从物质上说，是食、衣、住、行，人要过物质生活，非从事经济活动不可，所以国父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非常注重。并认为：“我们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解决生产的问题，就是分配的问题，也要同时注重的”。这足以证明国父对经济的重视；经济在人类社会历史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不可否认。然而谓人类活动完全出发于物质基点之上，则属过于武断。历史上常有在一种生产方式之下，发现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及社会组织：例如纪元前五六世纪间之希腊各城邦，同属初期农业时代，其生产方式，大致相同，然雅典的民主政治与斯巴达的寡头政治，同时并存；现代的英美苏法德意诸国，其生产工具与生产方式，亦大致相同，然或为民主国家或为独裁国家，或为资本主义，或为社会主义。这些历史的事实和现代的事实，足以证明：生产制度并非人类活动的单纯因素，盖人类意志的力量，亦往往可以左右一切。我们虽否认唯心史观，但对意识要素的作用，决

不能不加重视。社会唯物论者对于此点，认为在同一时期同一生产手段之下，所生的纷歧意识及组织，亦纯为生产力反映的现象。假使更深一层探讨生产的发现，究竟何自而来，便无法抹煞意志活动的重要了，譬如近代科学上改良生产工具的种种新发明，岂不是人类意志活动配合着物质条件所产生的结果吗？如果没有人类的意志活动，虽在近代所处的客观环境下，改良生产工具的科学知识还是不会发明的。由此可见，社会唯物论者仅在人类活动全程中，截取若干片段的变更现象，为其立论根据，它之不合真理，与自然唯物史观者，实没有多大差别。总之，自然唯物史观以自然力说明历史的演变，社会唯物史观以经济力说明历史的演变，它们都只看重历史中客观的物质的力量，而忽视了历史中主观的精神的力量。然而历史之造成，是由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精神与物质的统一。没有客观的物质的力量，固然不会有历史；同样，没有主观的精神的力量，也不会有历史。但客观的物质的力量，只是历史中消极的被动的因子，唯有主观的精神的力量，才是历史中积极的自动的因子。所以在历史中占主要地位的力量，不是客观，而是主观，不是物质，而是精神。唯物史观只是看重历史中客观的物质的力量，其不合科学法则，可以想见。

心物二元史观者则超脱于唯心与唯物两说之外而又介于两说之间。认人类的活动，既非纯为意志所支配，亦非纯为物质所决定,乃由于心性与物质两者相互为用的结果。心性可影响枷质杀件，物质条件亦可影响心性。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地理学派的社会思想家巴克尔认为，自然界与心理二者，各有其独特的定律,人类可以改变自然界，自然界亦可以改变人类。德国社会主义者柏恩斯坦认为，物质的经济劳力与人类精神作用，均可为主动的元素，但两方作用的大小，则随社会进化而

消长；在初民时代，人类几全为自然力所支配，故思想行为均为经济所决定；但社会越进步，经济条件的力量日即减退，迄近代文明社会，非特经济不能决定意志，而意志反有决定经济环境的可能。最近英国学者罗素亦认为，政治生活乃由物质条件与心性交互作用所决定。此说的根据，当然比较偏于精神的唯心史观或偏于物质的唯物史观之学说为切近事实，然而观心理及物质两者，在人类行为的发动上为两种分离独立的因素，则尚嫌失之浅近。故以上三派学说的观点，虽各有不同，然其不合真理，则殊无二致。

以上三派学说，都只见到历史的一面，偏而不全，不能说明历史的整体，这一任务，只有唯生史观足以完成。它批判地接受了各派学说的精华，再加以国父自己独见创获的许多真理，融铸成为整个的完美的思想体系。所以唯生史观是一种最高综合形态的历史观，毕竟成为“后来居上”。

唯生史观以生的宇宙观为其理论根源。认为：“生是宇宙的重心，民生是人类历史的重心”。唯心与唯物，只是生的一体之两面：着眼于能力或动态方面的人，认宇宙为精神；着眼于体质与静态方面的人，认宇宙为物质；殊不知二者本合为一，不可分离。遍察宇宙一切现象，用“生”之一字来解释，可以亘诸万古，放乎六合，将无往而不适宜。国父认为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他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这就是说生元为一切生物的基本单位，宇宙一切现象，都是生元所组成，生元继续不断的活动，变化，与重新排列，以演出生生不息的现象。宇宙一切现象，都充满着生意，人类是寄生于宇宙间，也为着生存赓续活动，以构成社会时空的发展，其发展过程，就是一部人类生存进化史。这种生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实包含了中国固有的正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术思想和欧美社会科学的精华，且是国父独自创造的新见解。我们先从中国固有学术探讨它的思想渊源，《易·系辞》说：“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感而万物化生”，“生生之谓易”；《中庸》称：“至诚无息”，‘“生物不测”；《程子》说：“天地之气，自然生生不穷”；《朱子》更认为：“天地是以生物心者也”。从内容方面观察，唯生史观之主张人类求生存，是要求全体人类的生存，并非要求部分的或个人的生存；它之主张解决民生问题，是要解决全体人类的民生问题，不是要解决部分的个人的民生问题；这个要求解决全体人类生存的思想，很显明地是从中国固有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而来。所以唯生史观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正统思想，实毫无疑义。其次，从唯生史观之包括了欧美社会科学的精华来说：西洋的生机论者杜里舒、柏格森诸人，受了唯物论机械论的反感，努力唯生哲学的研究，有很大的成就，柏格森在其所著《创化论》中，认为生物之生都是有一种冲动之力存在，生物的发展，都依此演行。史学家鲁滨逊在其名著《新史学》中，更作深刻的阐明。被称为社会学创造者的李博德，用生命保养的原则，说明整部文化进化史，认为社会进化不外是由生命的保养在时空中的扩大。同时，美国孙末南在他的《民俗学》一书中，认为生命的第一业务就是求生存。毛尔铎说：“求生存的观念，是一个确切的观念，无论持何种思想的人，都不能否认，求生存的冲动和求生活条件的适应，是一切明显不可抗争的事实。因为它是一切生存有机体的特征，人类缺此特征，也就不能生存。”到了威廉时代，唯生史观更为长足的进展，他在社会史观中适切地说明社会进化的中心问题，是要解决生存问题。威廉氏的社会史观，他们归纳其要点有四：第一，“所有已往的历史，不过是人类努力求生存的试验与失败

的记载”；“一切社会进步的目的和宗旨，都是谋解决生存问题的”。第二，“阶级斗争是一个果，不是一个因”；“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解释社会进化的果，并没有解释社会进化的因，所以它所有理论，都一齐颠倒”。第三，“在消费者地位的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是相同的；社会进步，乃是适应在社会份子地位与消费者地位的大数的经济利益的”。第四，“马克思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他把他所研究的病理，误以为他是所考察的社会生理的定律；阶级斗争是社会病理的特征，好象人身上的痛、热、纳肿病的特征一样：前者不是社会的定律，正犹如后者不是生理的定律”（以上所引，均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第八章）。社会史观的这四个要点，唯生史观都把它批判地接受了。

现在再从国父独见创获的真理来说，唯生史观虽一方面渊源于中国固有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又渊源于欧美社会科学的精华，但不加上国父独见创获的真理，把它融会贯通，组成一个新的学说体系，那末这除了把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思想混合在一起拿来复说一遍外，决无其他意义，这样，仍然不会有唯生史观的。所以国父的独见创获，实为唯生史观的重要部分。我们从唯生史观的内容上看，“天下为公”之思想，固然是渊源于中国固有的《礼运·大同篇》而来,但《礼运·大同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谓大同”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是空想的大同主义，没有使之实现的方法，理想终属于理想而已；然而一到唯生史观里来，便变成了科学的大同主义，提出了实行的方法，使它能够见诸实行，这个方法就是建立于唯生史观理论基础上的三民主义。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在求国际地位平等，使世界趋于大同的方法；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是在求政治地位平等，使政治趋于大同的方法；三民主义的民生主

义，是在求经济地位平等，使经济趋于大同的方法。在这三个实现大同主义的方法中，尤以民生主义中之国营实业，节制私人资本和平均地权的方法，更为重要。只有它才能造出实行大同主义的基础，才使大同主义由空想阶段走到科学阶段。由此可知中国固有之“天下为公”的思想，到唯生史观里便增加了新的内容，这就是国父独见创获的真理。其次再就社会史观来说，国父对威廉氏的社会史观，并不是囫囵吞枣的搬到唯生史观里来，而是对它作了一个改良，第一，社会史观认为“求生意志才是普遍的经济问题”，国父则认为“民生才是历史的重心”，只言“民生”，并没有提出“意志”来。第二，社会史观认为“并不是经济进化产生社会进化，而是社会进化指挥经济进化”（以上所引，均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史观》第八章）。国父则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这简直是把威廉氏的意见颠倒了过来。由此可知，社会史观被吸收在唯生史观里，是奥伏赫变地改头换面，脱胎换骨了。

国父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他是非常看重人力的，因此，他所创立的唯生史观，对唯心史观的正确部分，都批判地接受了。唯心史观看重精神力量，唯生史观也看重精神力量，故曰：“物质的力量小，精神的力量大”；“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终有成功之一日。……心之为用大矣哉！”所以认为心理建设非常重要。这是唯生史观接受了唯心史观的部分。在另一方面，它对唯物史观也同样批判地接受了它的精华。唯物史观看重经济，唯生史观也看重经济，故对人民食、衣、住、行等生活问题，非常注重，因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所以“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足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各式房舍，以乐民

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这里所谓“农业”、“织造”、“建筑房舍”、“修治道路运河”，很显然的是人民物质生活，属于经济范畴。同时，属于经济范畴的‘“生产问题”，“分配问题”等，也很重视。这是唯生史观接受了唯物史观的部分。但它并不是心物二元的混合体，认为：“精神离了物质，即无由表现；物质离了精神，亦不能致用。所以精神与物质，实为一体之二面，一物之二相，相因而生，相需而成”。这是总裁对于唯生史观精致的阐发，因为心和物不过是生之不可分离的两面，所以唯生是一元的，不是二元的，这可从下列方式得到证明：

（1）物质＋精神＝生之体

（2）空间＋时间＝生之用

（3）生之体＋生之用＝生命

由上所述，可知唯生史观不仅吸收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精华，而且较之心物二元史观也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它认为人类永续的生存，即基于继续不断的为了求得安逸生活而克服自然的努力。在克服自然努力中所发生之生产力的进步，则基于为了解决人类社会间所发生的困难之更进一步的克服，换句话说，生产力的进步，乃由于人类为了解决其生活上的困难。到了进步的社会中，生产力的更进步，亦由于人类为了增加生活资料的丰富，为了增加生活上的便利，为了增进普遍人类生活的健康与幸福的保证。所以唯有民生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动力。在产业革命之前，蒸汽机所以独首先出现于英国的原因，是当时英国两千万人民在若干年来所感到生活与生存上的困难所由发生之结果。中国地大物博，生产丰富，没有这种创造的必要，因而一切均没有进步。近百余年来，西欧因为有了蒸汽发动机，产业愈发达，所引起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亦愈多，而

且愈困难，民生问题亦愈趋严重。三十年中，竟发生了两次人类互相残杀的世界战争，这就是由于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缘故。

其次对于“唯生”两字的意义，还要加以说明：第一，唯生就是“人类求生存”，所以“人类求生存，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这是偏重于历史中人力方面的说明；第二，唯生就是“人民的生活”，食、衣、住、行，是人民生活的四大需要，只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其余的问题，也就可以随之而解决，这是偏重于历史中物力方面的说明。把这两个意思统一起来，则唯生史观以“民生为历史的重心”去解释历史的进化，就是统一历史中主观因子的人力和客观因子的物力去解释历史的进化了。事实上人要维持生存，固然离不开经济，但经济始终是工具，人类求生存才是目的，我们不否认工具的重要，而尤注意目的的重要。经济并没有自动的作用，它的存在及变化决不能离开人，从其存在来说，它是为人而有；从其变化来说，它是为人改造。所以并不是人隶属于经济，人为经济所决定；反之，倒是经济隶属于人，经济为人所决定。唯物史观只看重经济而不看重人力，唯心史观只看重人力而不看重经济；心物二元史观虽能两者并重，但不能把它统一起来，这都是不完全的。只有唯生史观把人力与经济作统一的观察，才能说明人类社会的史实，这便是国父独见创获的真理。总裁继承遗业，站在唯生史观的立场，对于唯心史观与唯物史观予以严正的批判，认为：“这两种学说，都可说是一偏之见；不能够概括人类全部历史的真实意义。因为人类全部历史即是人类为生存而活动的记载，不仅仅是物质，也不仅仅是精神，所以唯有以民生哲学为基础的民生史观，或以民生史观为出发点的民生哲学，不偏于精神，亦不偏于物质，唯有精神与物质并存，才能说明人

生的全部与历史的真实意义。”（见《三民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实行程序》）我们得到这样的指示，更了然于唯心论的空虚与唯物的机械，它们都不合于真理。只有唯生哲学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唯生”绝不是一个玄学体，在各种科学发明上，都能找到“生”才是宇宙中心的发明，宇宙一切都是生元所构成，生命是宇宙的总表现，整个宇宙只是一个“生生不已”的大过程，在外延上，是万物化育；在内含上，是生命机能。宇宙的实质，就是一个滔滔滚滚奔进不停的伟大生命长流。在这生命长流的过程中，万物各为生存而努力，一切现象，就是万物求生存的结果。求生存即民生问题的解决，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生存基于保障，生计重在发展，生命重在繁衍，都是人民生活现象，统名之曰民生。民生就是社会进化的基本因素，亦即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社会组织的形成就是由人民生活状态而决定。唯生史观就是本着这个观点，来说明社会的进化。

原载《文化先锋》第五卷第十二期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